

中国市场经济运行障碍 分析与预测

ZHONG GUO SHI CHANG JING JI YUN XING ZHANG AI FEN XI YU YU CE

◎邱力生 著



中国市场经济运行障碍
分析与预测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市场经济运行障碍 分析和预测

邱力生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市场经济运行障碍分析和预测/邱力生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6

I. 中... II. 邱... III.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5362 号

中国市场经济运行障碍
分析和预测

邱力生 著

责任编辑 文 菲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8.5 印张 201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81031—953—1/F·047

定价: 15.00 元

前言

国内外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像谜一样，20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常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困难，似乎总没有走出“困境”，可就在这情形中，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据传说要不是中国自己坚持说，中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就要把中国列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然而，在成绩面前，我们也还是应该清醒地看到，阻碍我国经济运行与继续发展的问題仍然很多，须不断总结经验，分析矛盾，研究规律，否则就难以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许多多“反常”、“悖理”的现象。

例如，资金供应充实，到 2000 年 2 月老百姓手中已达 6 万亿人民币，但企业却普遍感到资金缺乏；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而国家财政却经常捉襟见肘；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但企业和农民却感到负担不堪承受；预算外收入与预算内收入并驾齐驱；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但大多数居民收入低下却成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资金是短缺的资源，但其名义价格却十分低下；股权融资的回报率本应该高于债务融资的利息率，但企业却感到债务融资的成本比股权融资的成本更高；企业把银行债务称为“负担”，但行动上却对银行贷款趋之若鹜，并称之为寻求银行“支持”；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但财务状况却日趋恶化，亏损面居高不下；全世界的企业家几乎都认为中国的投资空间广阔，甚至说在中国就是摔一跤也能捡一个项目，迫不

及待地希望中国的大门开得更大，但中国的企业、银行却都觉得没有好项目值得投资，不知道新的增长点在哪里；一些企业“虚盈实亏”，另一些企业“虚亏实盈”；加工贸易原本是一种变通的贸易方式，却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方式；中国以最开放最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成为外资输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国际收支表却显示中国有时是资金净流出，等等。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成绩还是问题，有没有规律可言？取得了成绩，是谁在努力？出了问题，是谁的行为所致？经济体制改革谁是得利者，谁是失意者？

经济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当前的运行问题，如有效需求不足、扩大内需、通货紧缩等的论述非常充分，可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前这些运行表象与前几个高通货膨胀和市场“疲软”阶段有何关联？好像并没有人去探究。

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结合，最终只有一个落脚点：每个（起码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喜与忧，都与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富民政策，出现了一些富人及众多还没有富的穷人相关，或者说经济转轨中许多事情的症结都可以在“贫富”上找到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富民政策，可以从正面引导、激发一部分人、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的积极性；有人却从反面理解，不择手段富起来，把它变成负面效应。不管怎样富起来的人，由于他们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社会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和行为对下一个阶段的经济运行无疑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穷人对运行的影响虽难与富人相比，但也能用自己的方式作用于经济运行，例如，几十万“大军”涌向内蒙古挖甘草、挖发菜，北京郊区数万人上山非法挖野生药材，造成植被严重破坏，其中富人恐怕微乎其微。

有许多学者对贫富差距的研究，主要是考虑两极分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提出防止两极分化的政策措施。本书并不研究贫富

差距，更不是研究阶级问题，而是通过研究贫富形成的制度、政策和其他的条件，分析贫、富两个层次在转轨经济运行中各自的地位、作用及它们所能控制与依据的条件对经济运行发生不同的影响，以及国家对此如何作为，并根据过去的发展预测未来的问题，力求寻找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运行特色。

所以，本书的市场经济运行是指转轨经济运行，虽对将来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进行了预测，但并不论述它。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转轨运行态势分析	(1)
一、1978~1984 年的起步回顾	(2)
二、1985~1988 年大“热”的思考	(6)
三、1989~1991 年骤“冷”的表象与成因	(25)
四、1992~1993 年过“热”的两面性	(29)
五、1994~1996 年着陆成功令人回味	(34)
六、1997 年至今的又“冷”现象探因	(39)
七、运行态势“热”“冷”周期交替及原因	(48)
八、中国经济还要“冷”多久	(53)
第二章 推动中国经济运行的力量	(64)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先导力量	(64)
二、政府的改革动力和功能及作用	(65)
三、“先富起来的人”的推力	(74)
四、“公款”投资与消费的巨大“魔力”	(84)
五、工薪阶层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93)
六、合力的成就与发展	(100)
第三章 向市场经济转轨运行的双层性	(111)
一、转轨经济运行分析的新角度	(112)
二、影响分配的力量与运行双层的关系	(114)
三、转轨经济运行双层性的理论界定与特征	(122)
四、运行双层性成因的理论认识	(126)
五、双层性对宏观调控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128)

第四章 双层运行的环境障碍——正式制度“缺失”	(132)
一、转轨经济中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132)
二、制度的含义、结构与功能	(134)
三、制度变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40)
四、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144)
五、我国制度非均衡向均衡转化	(152)
第五章 双层运行的氛围缺陷——非正式制度“适应阻滞”	(160)
一、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的关系	(160)
二、没有道德心态，追求利益是“洪水”	(163)
三、什么文化使经济成“活水”	(168)
第六章 双层运行的效率阻碍——“信用”不足	(174)
一、信用的概念与失信对运行的影响	(174)
二、生产及经营者对消费者信用欺骗	(179)
三、生产经营者之间的信用缺乏	(184)
四、社会经济管理者也信用不足	(187)
五、企事业及社会公众组织信用缺损	(188)
六、信用不足的评析与解决的方案	(191)
第七章 双层运行的潜在危机与调节	(196)
一、高层主体消费及心态对双层运行的影响	(196)
二、低层运行主体被吸纳过度的后果严重	(204)
三、资源贫乏、环境污染与发展的矛盾	(214)
四、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低层运行能力	(217)
五、调节资源与制度关系，间接抽富带贫	(223)
六、稳定双层运行中政府的作用	(231)
七、减少曲折，需要预测和理论创新	(235)
八、从双层运行转向理想的单一运行模式	(249)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转轨运行态势分析

回顾 20 年来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理论界一般认为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78 年 12 月到 1984 年 9 月,这是改革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重点在农村,同时也在城市进行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创建了经济特区(在这个阶段中还包括一个短暂的“洋跃进”的热潮,因其影响不是全社会性的,故不将其作为一个阶段来研究)。第二阶段是从 1984 年 10 月到 1991 年 12 月,这是改革的展开阶段(从发展的角度看可以说是波折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重点在城市。国有企业是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价格改革是关键,并且改革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技、教育等社会各个领域。第三阶段是从 1992 年初到现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改革的重点是制度创新,主要是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

当我们另外从运行和发展,或者说从改革过程影响经济转轨运行态势的角度来看,这 20 多年的经济运行则明显呈现出这样的轨迹:两个周期、六个阶段。两个周期即 1985 年到 1988 年的第一个大“热”到 1989 年至 1991 年的第一个过“冷”,然后有 1992 年到 1994 年前的第二个过“热”,经过软着陆的二三年,到 1997 年至 2000 年(至今还未结束)又出现过“冷”。六个阶段是指以上四个阶段再加 1978 年至 1984 年的开始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与 1993 年下半年开始到 1996 年的成功实施软着陆的阶段。这种阶段的划分既可以从各阶段的社会经济生活表象来看,也可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资本利润率、居民工资、消

费指数以及就业等情况来判断。

当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划分并无正式文件为依据，只不过是本书从转轨运行的发展过程中，看出这种轨迹。在这轨迹中呈现这样的基本状态，即每当改革前进一步，党的富民政策就进一步落实，出现一批“富人”。这些先富之人又必然会以自己的经济地位而进一步作用于社会经济。或投资，力求更“富”；或高额消费，过上好日子；或储蓄，将来消费。众多富人的趋同行行为，自然会影晌经济运行的轨迹。当然这种影响在经济转轨初期还不大，越到后来力度就越大。

一、1978~1984 年的起步回顾

我们回到历史的起点，1978 年 12 月 16 日，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 18 户饥肠辘辘的农民在一张契约上签名画押，决定把集体耕地分开，包干到户。他们这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向温饱迈出的艰难的第一步。

也许是巧合，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并不知道过了两天，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出现：1978 年 12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总政策。提出了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此这场改革实际上“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提出，“采取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努力采取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开始。

1. 农村生产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

我国农村改革为什么最初开始于安徽省凤阳县？首先因为这里很穷。受原有人民公社的体制束缚，经济难以发展，到 1978 年底，全县生产队固定资产总值只有 1879 万元，只能抵上国家

贷款的1/4。农民生活异常困难。可这里资源丰富，交通方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发展农村经济十分有利。可农民为什么没有饭吃？

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凤阳县的干部和群众解放了思想。一些生产队先后实行了“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的生产责任制。在省委领导的支持下，生产责任制很快在全县推行。仅一年的生产责任制就使该县的农业生产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97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49%，油料总产量比1977年增产3倍，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81元增加到150元，翻了近一倍。

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又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这种肯定，与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相比，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又规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也就是说“制度创新”这时还不到位。

人们只有在实践中，寻找适合于规范大家行为的规则。有的地方明的没有包产到户，实际上暗中在搞包产到户；有的地方暗中实行的包产到户逐渐公开化；一些原来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在邻近社队的启发下也相继采用。经过实践，包产到户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尤其是那些长期贫困、实行包产到户较早的地区，其成就更加显著。如安徽、河南、山东等省一些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社队，实行包产到户一年，就改变了原有的局面，有的不仅不再吃救济，还偿还了贷款。

群众的创造如果不能变成正式政策、制度的话，就难以持久规范生产经营者的行为。当时的党中央很重视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在政策上作了调整，颁布了一系列文件来保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到1982年6月，全国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的生产队

已经占 86.7%，不仅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实行，富裕和比较富裕地区的社队也纷纷实行，而且大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随着包干制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从事生产经营所必需的生产要素以及技术、经营能力等在各个农户之间分布极不平衡。有剩余劳动力缺乏资金，有资金缺乏技术，使劳动、资金和技术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此外，也有的农户承包了大面积农田，迫切需要为生产过程及产前产后提供多种服务，这就在客观上要求进行新的经济联合。

由此各种新的合作组织应运而生。有生产过程中的合作，也有产供销全过程的合作；有农户之间的合作，也有农户与集体企业或国营企业之间的合作；有劳动合作，有劳动与资金的合作，也有劳动与土地的合作；还有以统一经营、统负盈亏的方式所进行的合作；也有在家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础上通过有偿服务的形式所进行的合作。许多村在不改变家庭经营的条件下，实行统一耕种、统一打药、统一灌溉、统一收割。其中多数村成立了若干服务性公司，承包农户干不了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由公司提供有偿服务。在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农民自己创造的新型合作，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民致富的进程。

2. 生产经营管理与政权机构的分开改革

1958 年以后，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体制，它既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又是集体经济的直接领导机构，一身二任。这种体制弊端重重：首先，由于行政活动和经济活动，本来各有不同的规律，硬把它们合在一起，容易造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经济就被管死了；其次，公社干部是国家委派的，拿国家工资，与农民缺乏直接的利益联系，这样管理必然出现强迫命令和瞎指挥；再次，公社内的“三级所有”往往成为“三级隶属”，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是听命服从的关系，就为“一平二调”提供

了机会，使农民的正当利益和农民、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样的体制完全不适应农村生产力状况。随着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和多种经济联合的发展，“政社合一”的体制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1984年底以前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到1984年底，全国已有99%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

在政社分开的同时，在基本上相当于原生产大队的范围内设村，成立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负责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支持和组织村民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

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是由农民自己不受地区限制，自愿参加或组成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事实上，自人民公社解体后，只有原来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才保留或重建了经济组织。原来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实力较差的地区，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其集体经济组织也基本瓦解。

3. 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要使农村改革成功，除了以上的改革外，还离不开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在当时的体制下，很容易地调整了城乡关系，这就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79年起，中央政府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提价产品有18种，包括粮食、油脂油料、棉花、生猪、菜牛、菜羊、鲜蛋、水产品、甜菜、甘蔗、大麻、苧麻、蓖麻油、桑蚕茧、南方木材、毛竹、黄牛皮、水牛皮，平均提价24.8%，一年提价金额达70多亿元，其中粮食、棉花超计划收购部分还加价50%。这次调价之后，农产品收购

牌价指数比上年平均上升 22.1%，包括超购价上升 25.7%。1980~1985 年，对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又作了多次调整，使其价格水平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民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我国的农业生产有非常大的发展，粮、棉、油以及各种经济作物的产量迅速大量增加。另一方面，这种改革是将原有的集中统一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交给千千万万的个体农民，使生产经营的条件、经营能力以及文化素质和家庭情况具有一定优势的农民就先富起来了。

二、1985~1988 年大“热”的思考

“热”的含义是指投资和消费都很旺盛，需求拉动物价持续平稳地上涨，而所谓“大”则是指投资、消费、物价等增长超过正常幅度，所以，本书把大“热”界定为一种经济运行的态势。

在前一阶段改革成功的鼓舞下，人们又寄希望更大范围的改革。1984 年 10 月党中央及时作出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这就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改革极大地推动经济运行。由于改革放活了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方面都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本单位、本地区，为自己增加更多的收入，由此上演了许多人间喜剧。

1. 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改革

这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是城市，首先是要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为达到这个目的，当时的政策措施限于特殊历史条件，只能是从放权让利开始。

(1) 放权

对国有（当时叫“国营”）企业的放权改革，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就已经开始探索（1979 年 10 月，国务院就下

发了关于国营企业自主权的 5 个文件)。到 1984 年末和 1985 年初,则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主要是从 10 个方面扩大了企业自主权:①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和国家供货合同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安排增产国家建设和市场需要的产品。②除国家特殊规定不准自销者外,企业分成的产品、国家计划外超产的产品、试制的新产品等都可以自销。③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的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的产品,一般在不高于 20% 或低于 20% 的幅度内,企业有权自定价格。④对于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在订货时企业有权选择供货单位,可以和供货单位签订合同,直接供应。⑤企业可按规定比例自行支配使用留成资金,有安排技术改造项目的权利。⑥企业有权把多余、闲置的固定资产出租或有偿转让。⑦企业有权按生产特点和实际需要,自行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⑧厂长、党委书记分别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厂级行政副职由厂长提名,报主管部门批准;厂内中层行政干部由厂长任命;企业可以从外单位、外地区招聘技术、管理人员;厂长有权对职工进行奖惩,包括给予晋级奖励和开除处分;企业有权在劳动部门指导下公开招工,择优录用。⑨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自选工资形式;厂长有权给有特殊贡献的职工晋级,每年的晋级面可以增加至 3%。⑩企业有权参与或组织跨部门、跨地区联合经营。

这些规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方式明确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并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由试点推广到全面实行。1985 年 2 月,又提出给企业推进技术进步的自主权,决定自己的技术发展方向和拟订技术进步规划。9 月,又进一步允许以大企业为主体,打破所有制界限,搞跨地区、跨行业、跨城乡的经济联合和协作,并提出给部分大型企业直接对外经营权。1986 年,规定企业可以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包括增资指标)和政策范围内,自主决定职工工资和奖金分配的具体形式与办法。

(2) 让利

国家对国营企业的“让利”也是从第一个阶段开始的。1978年，国家对企业实行按工资总额提取企业基金的制度。1979年，国务院提出了全额利润留成办法。利润留成制的实行，扩大了企业财权，但没有考虑到，这个办法使原来利润少、增收潜力大、用人较多的企业，留成比例大，而那些经营管理较好、利润大、用人少的企业，留成比例却较低。这样，前者利润增长容易，后者则相当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80年，国务院印发《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决定将全额利润留成改为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并对盈利水平高、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超过历史最好水平的企业，采取利润留成基数一定几年不变的办法，以解决“鞭打快牛”的问题；对生产任务不足、产品结构变化，造成利润大幅度下降的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分成办法；对微利和亏损企业，采取利润包干和定额补贴、减亏分成办法；对矿山企业本着“以矿养矿”的原则，采取全额留成办法，把利润大部分甚至全部留给企业。

后来为了稳定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克服利润上缴制度苦乐不均的弊端，国家于1983年1月和1984年10月，分两步对国有企业实行了利改税，税后利润归企业自主安排使用。

实际上，第二阶段对国有企业的最大的放权让利是对大中型企业的承包制和对中小企业的租赁制。

(3) 国有企业的承包制与租赁制

承包制在这一阶段的初期进行试点，到1987年初才开始大面积铺开推行，到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承包面已达78%，大中型企业达到80%。

从改革的实践情况看，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制，即对不同企业根据情况确定包干基数，超收或减亏部分，有的全部留给企业，有的按规定比例分成。它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①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企业缴税后，在核定上缴利润基数的基础上，逐年按规定的递增率向财政上缴利润。②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确定企业上缴利润基数，对超收部分按合同规定进行比例分成或分档分成。③两保一挂。在企业保上缴利润、保完成规定的技术改造基础上，企业工资总额和实现利润或上缴利润挂钩，按国家核定的系数，工资总额随上缴利润浮动，一定几年不变。④微利或亏损企业的定额包干和减亏包干。

承包制是把经营自主权交给企业。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归谁调配、指挥、领导，谁的利益可能就是最大的，承包后必然出现一些财务漏洞。1987年，财政部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财务问题作了暂行规定，明确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范围和责任。企业只包上缴所得税、调节税，不能包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盐税和其他各税。承包后实行收支两条线。企业仍照章纳税，超额完成上缴目标任务的实行超目标分成。企业应得的好处由财政部门按承包合同规定清算，拨给企业，作留利处理，不得在交纳所得税、调节税时，直接抵扣或作退库处理。

国有小企业采取租赁经营，是指在不改变企业的所有制的条件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家授权单位为出租方，将企业有限期地交给承租方经营，承租方交付租金并依照合同规定对企业实行自主经营的方式。一般是企业所在地方政府委托的部门为出租方，承租方则可以是一个人或几个人，也可以是企业全体职工，还可以是其他企业。无论个人承租还是合伙承租、全员承租，承租者必须出具与租赁企业资产成一定比例的个人财产（其中要有一定比例的现金）作为担保。个人承租的，还要有不少于两名有相应财产可资担保的保证人。企业承租的，必须出具与租赁企业资产一定比例的留用资金作为担保。

承包与租赁制不能说完全没有成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